

## 南進政策下的籍民教育（1895-1937）

王學新

### 摘要

籍民教育起初是民初居留華南一帶之臺灣人，因工作需要而自行辦學教授日語。在華南日本領事亦感到有教育臺灣籍民成為日本人之必要，遂陳請臺灣總督府補助興學，並派遣教員。總督府於考察當地情況後，決定以臺灣公學校為基準，在對岸之福州、廈門、汕頭等地設置教育籍民子弟之學校。

一般以為籍民教育僅是臺灣公學校教育之延長，其目的在於教育在華臺灣人為良順的帝國臣民。但由於這種方針必然會受到當時日本政府大陸政策及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之影響而逐漸變質，反而以教育中國人為主。其目的有表裡兩個，表面為中日親善，裡面為扶植潛在勢力。

但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持續侵略，使得中國人澈底瞭解中日親善僅是謊言，而發起排日運動，且在教育上展開反日教育。如此，使得籍民教育無法達成其表面目的，但其裡面目的卻有相當程度的功效。

關鍵詞：臺灣籍民、排日運動、大陸政策、南進政策、臺灣公會

## The registered Taiwanese education under the southern advance policy ( 1895-1937 )

Hsueh-hsin Wang\*

### abstract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 registered Taiwanese education on China was just the extens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on Taiwan during prewar period. Her purpose was to educate registered Taiwanese to be docile subjects. But this policy must be affected by the continent policy of Japan government and the southern advance policy of Taiwan General Governor's office as to its nature changed gradually. Her students were mostly Chinese. The registered Taiwanese education had 2 purposes. The formal one was to cultivate relation of amity with China, and the inside one was to support latent power on China.

But owing to ceaseless aggression of Japan militarism, Chinese understood completely that the amity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as just a lie. So Chinese launched anti-Japanese campaigns and pushed an anti-Japanese education. Those made registered Taiwanese education could not approach her formal purpose, but achieved some desired effects of her inside purpose.

**Keywords** : Registered Taiwanese, anti-Japanese campaign, continent policy, southern advance policy, Taiwan Resident Committee.

---

\* Researcher, Taiwan Historica

# 南進政策下的籍民教育（1895-1937）\*

王學新\*\*

## 一、前言

籍民教育已有中村孝志等前人精闢之研究，<sup>1</sup>本無後人置喙之餘地，惟筆者拜讀之後，頗感疑問，故撰文以誌。

首先，教育無法跟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脫離關係，且經常受政策所影響，何況在當時局勢險惡、民氣激變的華南地區。故籍民教育方針，豈能不受當時日本政府大陸政策及總督府南進政策之影響？

第二，一般以為籍民教育僅是臺灣公學校教育之延長，但為何對岸籍民學校竟招收半數以上的中國子弟，其真正目的為何？效果又如何？

以往的研究多半由日本觀點出發，但實際上，籍民教育正是對華政策之一環，分析角度除殖民主義者日本外，亦須注意被殖民之中國與臺灣，兩相對照來觀察時，始能掌握事情的本質。

## 二、臺灣總督府對岸政策概述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7年1月22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3月30日。

本文原發表於2005年10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原題名為〈兩種認同下的籍民教育〉，當時承蒙鍾淑敏教授指正，使筆者受益匪淺，後已大幅修正。並感謝本刊兩名匿名審查人之指正，謹此致謝。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研究員

<sup>1</sup> 籍民為日治時期具有日本國籍之海外臺灣人。有關籍民教育之研究請參照文末徵引書目之中村孝志、梁華璜、鍾淑敏、卞鳳奎、陳小沖等人之著作。

臺灣總督府的南進政策，又稱為「南支」或「對岸」政策，其本質上就是一種從華南開展的「大陸政策」，以侵略中國大陸為主。

南進大陸政策之實施，始於日本取得臺灣。自 1896 年第二任總督桂太郎起，臺灣被主張成為南進論中的據點。其雖倡言「北守南進」，但僅是畏懼俄國在北方之強大勢力而暫時採取守勢而已。其南進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進取華南。如其所言「他日使華南一帶之地，恰如朝鮮半島一般。」<sup>2</sup>

1898 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就任後，更有明確的目標。

1899 年 6 月，在兒玉《有關臺灣統治之既往及將來之備忘錄》中，指出：

對於臺灣島民之統治，欲收十全的效果，不能只著重於島內的鎮壓及其民心的收攬。...如將眼光放大，且依照帝國占領本島之原意而經略，自可發現東亞有數之良港附屬於本島，並且幾百年來已為臺灣島民所利用。如能研究其利用方法，不但不荒廢天賦良港，同時亦符合帝國占領本島之原意；所謂東亞有數之良港，即廈門港也。<sup>3</sup>

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亦認為，必須在廈門設置臺灣銀行支店，使其成為「帝國在南清之前驅」。並以為：

應視臺灣之占領係一殖民站（station colony）而已，尚須設法南進，使華南及南洋群島之人民也能被及帝國之恩澤。<sup>4</sup>

由此可知，這時的南進政策主要就是從南方開展的大陸政策，附帶始及於南洋。

1899 年 12 月，總督兒玉源太郎向內務大臣小松原英太郎陳請擴大與廈門領事直接通信範圍之陳報書中，曾說：

<sup>2</sup>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 2 卷（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 年），頁 417。

<sup>3</sup>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年），頁 42。

<sup>4</sup>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頁 48。

臺灣之經營無一不有待於對岸的華南地方，且在華南地方扶持帝國之潛在勢力，與臺灣經營之成效大有關係。...至於對岸不割讓地之經營，目前已在我國人心中成熟，形勢促使其表現於外。

5

可見其積極南進之意圖。

實際上，當時孫中山靠著日本政府之奧援，已成為反清勢力之盟主，因而被總督府視為應積極扶植之對象。故當 1900 年義和團事件發生時，臺灣總督府已與孫達成協議，分別於廈門、惠州出兵，總督府並願意供給革命軍銀餉、武器、彈藥，但後因英美等列強干涉以致新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反對而作罷。<sup>6</sup>

且 1900 年 8 月 24 日總督府派兵入侵廈門後，引起市民極大恐慌。據閩報所載：

當時（9 月）4 日至 6 日之 3 日，大小汽船、轎子及人夫之工錢幾乎為平日之二十倍，由廈門至上海之船費平常為八元，現暴漲到二十四元。小汽船從廈門至石碼、同安間平常為十五錢，現漲至一圓。安海間平日為三十錢，現漲至二元。且搭乘戎客船因過度擁擠而沉溺者不知其數，或於海上遭遇海盜而隻身返回者，或遭風沉沒而溺死者。且由市內至波止場之轎子費用飆漲至二元左右，其混雜悲慘實不可名狀。<sup>7</sup>

又如某報載：

當地人民惶恐疑惑，接踵退去，人口幾乎失去一半。市中空虛，商業皆已停頓，盜賊橫行，此皆因日本採取行動所致。到達

<sup>5</sup> 〈臺灣總督卜廈門福州及上海、香港駐在帝國領事間ノ直接通信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0532\A00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sup>6</sup> 黃自進：〈利用與被利用：孫中山的反清革命運動與日本政府之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9 期（2003 年 3 月），頁 107-152。

<sup>7</sup> 〈廈門事件閩報記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0497\A001。

該地之英國軍艦於獲得清國官吏之同意後，率海軍登陸。此英國之措施雖欲恢復當地人民之信任，但日本之舉止實在無法了解。<sup>8</sup>

原本自甲午戰後，日本人之國際地位提昇，即使是中國人亦對日本人相當尊敬，認為是強國之民。<sup>9</sup>但此事件後，廈門人對於日本人的觀感一落千丈。<sup>10</sup>爾後兒玉、後藤悵然有失，開始轉向注意北方。惟日俄戰後，日人又積極在福建各地活動，但更增加中國人的戒懼，仍認為日本有意占領福建以取代東北。<sup>11</sup>

後任的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則專注理蕃與內政。大正時期（1911年）之後，總督府再度有積極南進之意。惟此後總督府的對岸意圖轉向以經濟文化上的和平發展方式，除積極促成中日合辦事業外，亦注意教育、醫院、報業等文化事業。其目的在於扶植日本在華南之潛在勢力。這時所謂潛在勢力，即是以臺灣籍民為主要媒介，聯絡親日分子而形成依附日本之勢力。

為何日本積極扶植在華之潛在勢力，此因中國自辛亥革命後軍閥割據而出現分裂危機，故日本官民皆認為此係日本千載難逢之良機，正可利用之以擴展日本在華之權益。尤其是陸軍當局，更是嚴陣以待，企圖伺機出兵大陸，<sup>12</sup>但仍畏懼列強干預，故平日以扶植潛在勢力為主，一旦有事，將成為一大助力。

至於臺灣總督府扶植潛在勢力的目的，則與穩固臺灣統治有關。1914

<sup>8</sup> 〈4 明治 33 年 8 月 31 日から明治 33 年 9 月 3 日〉，檔號：B02031928600，頁 5。（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以下簡稱 JACAR）藏）

<sup>9</sup> 〈對岸地方出張水崎基一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4541\A001。

<sup>10</sup> JACAR：B02031928600，頁 8。據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所言：「三十日英國領事於廈門各地張貼佈告，謂由於日本兵上陸，以致人心恐慌，故英國讓陸戰隊上陸。...如今帝國在廈門之威信已然墜地。」

<sup>11</sup> 1905 年 11 月 25 日美國駐廈門代理領事 Stuart K. Lupton 報告：《美國 19-20 世紀初駐廈門領事檔案 1844-1906》（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Amoy 1844-1906），美國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典藏，臺大圖書館數位化檔。

<sup>12</sup> 林明德：〈民初日本對華政策之探討（1911-1915）〉，《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集刊》，第 4 期下冊（1974 年 12 月），頁 413-459。

年 5 月 24 日，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下村宏致外務省小林欣一課長函中有：

「竊以為臺灣與中國之關係頗為密切，為確立本島統治之基礎，就必須先講求對華南之政策。」其意以為「原本臺灣與華南有密切關係，其人種、風俗、習慣、語言相同，多年之陋習牢不可破，彼等常思慕祖國中國，對岸之一舉一動立即使本島產生共鳴。故欲將其統一、包容，以同化成渾然之帝國臣民，實非一朝一夕之簡單事業。如那些長久以來未曾絕跡之陰謀事件，就明顯的證明那些土民之同化尚淺，此為臺灣之根本統治上要儘速樹立對華南政策之緣故。」<sup>13</sup>

此似乎僅是為了臺灣的治安而注意華南，但實際上絕非如此。

根據 1917 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編成〈臺灣與華南之關係及現在之設施與將來之方針〉，其中提及：

原本臺灣之統治就是我日本人是否能真正統治中國人的絕佳試金石，故若欲對華南達成日中親善之實效，就必須留意臺灣之內治。<sup>14</sup>（上標句點為筆者所加）

這句話說明了總督府的意志其實是與日本中央的意志，甚至陸軍主導的意志是相同的。日俄戰爭（1904-1905）後，日本一躍而成世界強國，國內因而陷入一片自滿的「大和魂」狂叫聲中，<sup>15</sup>並由媒體擴散至全體日本國民，而成為全日本社會的普遍信仰。因此，總督府的南進政策與中央的大陸政策並無二致，其方針以「日支親善」為掩護，來扶植潛在勢力，且其終極目的就是要「真正統治中國人」。

其又謂：

臺灣與華南之關係不可僅滿足於消極的維持治安而已，由人

<sup>13</sup> 〈2 特ニ臺灣警察処対策利用ノ件〉，JACAR：B03041647000。

<sup>14</sup> JACAR：B03041647000。

<sup>15</sup> 這種情景在夏目漱石的《吾輩は猫である》之中有提及。

種、地形及交通貿易之關係看來，最要緊的是兩者要互相崛起形成協同團體，以興起合辦事業，休戚相關，利害與共，再以此為基礎，進行聯繫。即在實業上，華南與臺灣恰如一國之狀態，若能互相扶持，彼此勉勵，則相對於中國中心而言，華南之勢力將會更為增加，結果日本之勢力將可遍及中國全域。而對華南施以如此積極政策時，首先必須要以建醫院、設學校、辦報紙等方式，使其基礎牢固，再期待逐漸貫徹方針。<sup>16</sup>（上標圈點為筆者所加）

由上可知，這些教育、報紙、醫院等文化事業皆與由南方開展之大陸政策有密切關係，此即臺灣總督府的對岸策略，而其終極目的在於扶植日本帝國在華南的潛在勢力。以下僅以籍民教育為例。

### 三、籍民教育宗旨之變化

臺灣的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積極往對岸發展，其企圖心於教育上表露無遺。他採納東亞會員中島真雄之意見，援助福州東文學堂，並開始於廈門經營東亞書院，<sup>17</sup>但其意絕非單純。

1899年12月，總督府提出〈向內務大臣稟請有關設立廈門東亞書院案〉，內有：

向福建省地方扶植本邦潛在勢力為屬於臺灣行政上必要事項，故在職權範圍內逐步進行。而認為目前最必須進行的策略，就是將文化普及到與臺灣關係最密切的泉漳地方，該地以廈門為中心，遂計畫設立日本語學校。因而依靠駐廈門帝國領事等人之斡旋，並集合當地有志者，以籌設廈門東亞書院。<sup>18</sup>（上標句點為

<sup>16</sup> 〈20 臺灣卜南支那卜ノ關係及現在ノ施設並將來ノ方針〉，JACAR：B03041652300。

<sup>17</sup>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天理教道友社，1988年），頁9。

<sup>18</sup> 〈廈門東亞書院設立ニ關シ内務大臣稟請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0427\A004。



筆者所加)

此雖非籍民教育，但與後來的籍民教育事業有一致的目的，即「扶植潛在勢力」。

如前述廈門事件後，當地人對日本之印象惡劣，以致東亞書院門可羅雀。又由於總督府當時財政拮据，且日俄戰爭在即，故無暇兼顧對岸，遂將此事委託民間三五公司，社長為後藤新平之心腹愛久澤直哉。三五公司於廈門設置事務所，業務分為事業部、教育部及調查部三部門，由總督府於 1906 年至 1910 年每年補助 55,000-65,000 日圓，其教育部門之主要事業就是經營東亞書院。<sup>19</sup>

愛久澤於調查書院情形後，發現學校課程不符合中國需要，且畢業生並無隔壁美系同文書院畢業生一般享有就業之優待（如任用為菲律賓政府書記等），因此不受中國人歡迎。故愛久澤主動雇用畢業生至公司所經營的潮汕鐵路等處，並企圖將書院轉型為鐵道員養成所。但由於中國利權收回運動興起，以致三五公司於華南事業不振，東亞書院於 1909 年 7 月關閉。

<sup>20</sup>

廈門事件後，總督府於對岸之教育事業中挫。在廈門之臺灣籍民，因事業上感到有必要學習日語時，僅能在領事及臺灣公會的策劃下，自費興辦學校。<sup>21</sup> 但這種教育僅算是日語補習教育，而與涵養所謂的帝國精神無

<sup>19</sup>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頁 9-10。

<sup>20</sup>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頁 10-11。

<sup>21</sup> 〈清國福州臺灣人子弟教育ノ為メ三屋教諭派遣ニ關シ照復ノ件（在福州領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5100\A015b。廈門臺灣公會於 1907 年 4 月初由在廈臺灣籍民組成，由於感到學習日語之必要，而在瀨川領事的贊助下，於 9 月成立「國語研究會」，每夜六點至八點上課。由國語學校畢業生潘濟清擔任教師。該會為臺灣公會熱心人士贊助而組成，以速成教育為必要，招收十六歲以上之男子，滿一年課程結束。教習及其他幹部皆為名譽職。於臺灣公會之一處設置教室，預定招收四十名，但入學者不斷增加，出席者每晚都有五、六十名。教授法大致採口授方式，以日常用語為主，將逐漸採用教科書。每四個月舉行小考，並有月考及定期測驗，得高分者將給予嘉獎。學生每月預付月謝為八十錢，研究會費用為月謝及熱心人士之贊助來

關。

福州方面，1900年5月由於福州領事豐島捨松之勸告而設立東瀛會館，至1905年時，由當時之會長書記生野口多內發起於南臺河乾街會館內設置中國式的學習場所。以中國人林姜皋為教師，學生9人，開始教授漢文及官話，此為該地籍民教育之濫觴。<sup>22</sup>但由於籍民不懂日語，與中國人無異，對日本並無任何「忠君愛國」的思想，因此日本領事憂心忡忡，認為不可忽視籍民的教育。<sup>23</sup>

1907年3月，福州領事館代理領事佐野一郎請求總督府派員教育當地居留民，於是民政長官祝辰巳派遣總務局學務課長參事官持地六三郎赴清調查。持地氏調查後，認為籍民子弟教育必須依據臺灣公學校之學科課程，並以有資格之教員來擔任教諭，且堅持對岸之臺灣人子弟教育必須是臺灣公學校的派遣教育。<sup>24</sup>至此，總督府開始重新注重對岸籍民教育，而先後創辦福州東瀛學堂(1908)、廈門旭瀛書院(1910)及汕頭東瀛書院(1915)。

1908年3月28日，總督府派三屋大五郎教諭來福州，於東瀛會館內開設東瀛學堂。<sup>25</sup>自該年4月9日開始授課。教學內容與臺灣公學校相同，由三屋擔任，漢文則由會館書記黃大均擔任。學生之中僅有4名籍民子弟，12名正申請入籍，又有會館館員親戚朋友之子弟17名入學，故33名學生

---

支付。費用為薪炭油費及掃除費，剩餘部份則為職員報酬。

<sup>22</sup> 〈4 臺灣籍民關係事項調查方二閱スル件 2〉，JACAR：B02031445200。

<sup>23</su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5100\A015b。1907年3月福州領事館代理領事佐野一郎請求總督府派員教育當地居留民，當時他指出「對於老一輩籍民僅能以利害關係進行拉攏與勸說，至於第二代籍民，也就是籍民的子弟，就不可忽略教育。」；「福州東瀛學校」，《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9（日本外交史料館藏）。據佐野一郎所言：老一輩已無可施之良策。但對於第二代籍民者，若今日放棄不顧，則臺灣籍民將更是有名無實。佐野認為籍民雖為日本人，但不能講日語，隨之無忠君愛國思想，與母國並未保持密切關係，將逐漸中國化。因而感到非常憂慮。

<sup>24</su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5100\A015b。

<sup>25</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9。

中，僅有 4 名為臺灣籍，其餘皆為中國人。<sup>26</sup>若僅是館員的親戚朋友子弟尚可稱為方便教學，至此亦可謂公學校之延長，但實際上又有變化。

三屋於 1909 年起擔任東瀛會館會長後，開始致力擴大學校規模，1911 年三屋勸導籍民捐錢於南臺蒼前山購入校地、宿舍。1914 年 1 月，總督府又加派 1 名助教，當時已有臺籍與中國學生 110 名，但其九成為中國人。三屋認為若設備容許，將有更多中國人入學。譬如 1914 年 2 月招生 40 名，卻有三倍中國子弟希望入學。<sup>27</sup>

辛亥革命後，美國 Methodist 教會傳教士於福建頻繁活動，福建省已成為其傳教重點地區，該教會設立不少醫院、學校，當時日本領事館附近新設置二、三所學校，每所皆花費十萬元以上。因此，三屋大五郎感於福建教育界之趨勢，而擬擴張既有學堂，計畫收容 300 名。故於 1911 年 6 月 15 日三屋致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請求補助建築費 5,400 日圓以建築蒼前山建地 90 坪的二樓校舍。1914 年 6 月 16 日，福州領事天野恭太郎以機密第一〇號「呈送東瀛學堂增築費補助申請書一案」致外務大臣加藤高明，請其向總督府溝通。<sup>28</sup>

美國教會的辦學並未影響籍民教育，為何日本領事及教育家竟如臨大敵一般？此因為英美教育對於當地人心所造成的影響感化相當巨大。<sup>29</sup>

而 1914 年 7 月 6 日加藤大臣轉送天野請求書給佐久間總督時，附言如下：

該地方與我有特殊關係，且（為教育中國人子弟是非常適當

<sup>26</sup> JACAR：B02031445200。

<sup>27</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9。

<sup>28</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9。

<sup>29</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9。天野領事認為：「教育固為美事，對於美人於本地設立學校，任何人也不應該有異議。但美國對於本地人心所造成的影響感化亦不可輕視。因此我方也要講求對策。鑒於此種情勢，竊以為三屋氏的計劃最得機宜。」

的計畫，請予以同意）回顧事業之性質，請考慮同意其請求。<sup>30</sup>

其中（）內為刪去之字句，由此可窺知籍民教育之目的已不僅是教育籍民而已，反而是以教育中國人子弟為主要目的。但歐美經營之學校無論在設備、學風、師資及畢業出路上，皆較日系更適合中國學生，<sup>31</sup>且鼓吹反日。

原本清末福建地方亦常有傳統秘密會社發起反教運動。<sup>32</sup>但民初之後，教會積極與在地社會融合，而衝突減少。尤以 1915 年日本逼迫中國同意二十一條要求後，福建地區反日風潮日熾，英美校系的基督教青年會時常散發反日的印刷品，並常以「誅日救亡會」、「噫中國危矣」為題，譯載日本國內激烈的侵華言論，而迎合當地人心。且歐美教會對於日本的侵華政策，多半採取批判的態度，<sup>33</sup>這直接影響到中國人，如廈門同文書院學生經常於外顯現反日的態度。<sup>34</sup>1916 年 9 月 21 日，在汕頭的英國傳教士影

<sup>30</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9。

<sup>31</sup> 〈廈門一年間ノ所感ト卑見（旭瀛書院岡本要八郎）〉，《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2414\A002。據旭瀛書院院長岡本要八郎報告，英華書院、女子師範學校（鼓浪嶼）、同文書院（廈門）等為英美人經營之學校，為雄偉的二、三層磚房，學生多達三百人，且有青年會傳播基督教，時常舉行通俗學術演講。或建立診療醫院，以富有、威嚴、慈愛、文明等為餌，致力收攬民心，其勢力極為強盛。且聘請名師，並協助畢業生進入香港、呂宋等地之學校入學，而認為非常適合中國人就學。相反的，日本人經營之本願寺、天理教等雖適合在華日人，但難以匹敵洋人傳教之勢力。

<sup>32</sup> 1906 年 4 月 20 日領事報告，《美國 19-20 世紀初駐廈門領事檔案 1844-1906》。

<sup>33</sup> 〈9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報告（第七報）〉，JACAR：B03041647800。這些外國教師常對中國人子弟說出下列的話：「日本...表面以善意來接近中國，但其心內卻有極大野心。看吧！就如同吞併朝鮮一樣，如同在滿洲的設施一樣，最初看起來好像是善意，但逐漸顯露出其本來面目。中國人民應注意日本人的行動，絕不可信賴接近這樣的人種。」

<sup>34</sup> 〈4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報告（第三十三報）〉，JACAR：B03041650700。廈門同文書院由美國領事監督，費用主要由中國人負擔，教師為美國人及中國人，教授科目主要以英文及漢文為主，程度近於中學。美籍教師屢屢於校內灌輸反日思想。〈3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狀況（第三十二報）〉，JACAR：B03041650600。「煽動中國人，鼓吹反日，...其方法為向基督教學校在學之青年子弟灌輸反日，而以此為中心，鼓吹

響下，福音學校的學生漫罵當地之日本醫生及東瀛學校校長。1916年9月27日，汕頭臺灣銀行附近市場，有二名英華學校學生發表鄭家屯事件的反日演說。<sup>35</sup>

日本調查後認為歐美將宗教與教育、政治相結合，並給予信徒一種安全、進步、新潮的感覺，因而廣受歡迎。<sup>36</sup>且由於西洋教會於民前40年便以辦學校及醫院進入當地，設置孤兒院、青年會、俱樂部，並為其教民喉舌，干涉訴訟事件，故勢力極為鞏固。<sup>37</sup>當時（1916年）在福州之基督教會大小共有300餘所，福建全省則不下700所。而傳教士及學校老師亦達二、三百人，教民總數將近十萬人。<sup>38</sup>

相對地，1916年間日本在福州僅有東瀛學校1所，而且日本籍居留民多半為臺灣黑幫，遭人唾棄。<sup>39</sup>

這樣的勢力日本豈能對抗？但其積極要教育中國人的真正目的又是什麼？

---

反對。且當地同文書院（中學程度）屬於美國領事之監督，故亦向其學生鼓吹反對，結果在學學生於報紙上發表反對文章。」

<sup>35</sup> 〈29支那並支那人二關スル報告（第二十七報）〉，JACAR：B03041649800。

<sup>36</sup> 「汕頭領事館報告書」，《外務省記錄》，檔號：6-1-6-0-66。如汕頭領事館宗村書記生所言：至於天主、基督教，「每週日、週三為各地之教民集會日，不論哪一教會皆充滿當地之男女老幼，一眼瞧去就可知其勢力不可輕忽。其中多半為青春男女，各自分席而坐，熱心傾聽講道。但他們是否真的能理解並咀嚼教義，因而強固其自我的信念，並對其精神修養有所幫助，則頗有疑問。總之，他們在外觀上似乎非常有虔誠之念，但於內心所想的，就是身為教民，一是供作免除官吏暴政之手段，一是獲得娛樂的或虛榮的感覺。若不覺得出入教會是件娛樂的事，就應該是對於非教民有一種驕傲的感覺。」

<sup>37</sup> JACAR：B03041647800。「彼等傳教士、牧師等藉著保護教民之名義，而干涉訴訟事件，不顧是非曲直，嚴厲向中國官吏抗議，或向本國領事或公使申訴，使其干涉訴訟，以權力保護其教民。中國官吏為考量自己之安全，而儘可能的默認彼等英、美人之專橫態度。由於有如此內情，以致教會及傳教士更加受到教民之信賴。」

<sup>38</sup> JACAR：B03041647800。

<sup>39</sup> 〈3支那並支那人二關スル報告（第二報）〉，JACAR：B03041647100。

總督府於 1917 年 5 月「在支那福州 福州東瀛學校概況」所言，學校的目的在於：

使籍民及關係支那人子弟準照公學校教育而成為忠實服從的順民。改隸以來，蒙受中國之惡劣影響大體上亦關聯到本島統治，此由屢次發生事變即可得知。故至少要對居留民加以指導啟發，使其與在臺人民無太大差別，且盡可能的透過他們逐漸於本地方致力鞏固中日親善的永久基礎。此為我政府所必須採行的自衛策略。這是本府認為必須要特別派教員，首先施以公學校程度之教育，再加以擴張的原因。<sup>40</sup>（上標句點為筆者所加）

亦即以教育為手段，由籍民擴及到「關係支那人」，<sup>41</sup>再推廣到中國人。最後使全中國人對日本的行徑有所「理解」，而不致於反對，且認為教育中國人是一種「自衛策略」。

1917 年 12 月 28 日，福州代理領事森浩致總督府民政長官下村宏「福州東瀛學校規則改正案」中，更明白闡明籍民教育的真正目的：

日中兩國之接近親善，從世界的大趨勢及東洋的新命運來看，則是兩國不得不採行之大方針。尤以戰後帝國對中國之經營必須要有堅固確實的根據地，且所需根據地愈來愈深且愈來愈廣。借款可行，合辦合作事業當然沒問題，而進一步考慮時，則

<sup>40</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9。

<sup>41</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9。所謂「關係支那人」，就是與籍民有關係的中國人，多半傾慕日本統治。「居留福州之公然聲稱為臺灣籍民的大約超過一千人，此外亦有可準照者。原本臺灣人幾乎視福州為故國，為政治、經濟、社會等一切之首腦地。籍民以外，不難想像其親戚、故舊關係者很多，改隸以來父兄伯叔或為臺籍或為中籍，子弟甥姪或為中籍或為臺籍，一家中分屬日中兩籍，自然不用說了。至於別家之親戚故舊，其離合錯綜自不待言。因此，未登記為臺籍者稱之為關係支那人亦不為過。雖然難以知道其人口究竟有多少，但由於實際上其與籍民無異。鑑於其對於臺灣之影響亦與籍民相同，故准許其子弟入學，同等的施以教育。」

歸結於中國的民族精神。<sup>42</sup>

籍民雖有日籍，但仍自認為中國人的不少，因此要：

喚起彼等籍民，使其真正感受到身為帝國臣民之名譽與感謝，使其升高到作為帝國臣民亦不感到羞恥的地步。故當然必須採行的第一步策略，就是透過籍民與關係支那人使日中兩國國民獲得正確的理解，貿易等關係更加密切，以穩固日中親善的永久基礎，此為帝國不得不採行的自衛策略。<sup>43</sup>（上標句點為筆者所加）領事與總督府異口同聲提及的「自衛策略」，就是「主權線」與「利益線」的概念。

1890年，山縣有朋內閣總理大臣於其「外交政略論」中，提出「主權線」與「利益線」之觀點，其內容如下：

「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曰守禦主權線，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禦利益線，不失自己之優勢地位。...何謂主權線？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與鄰國接觸之形勢，而與我主權線之安危有緊密關聯之區域也。...方今立於列國之際，若欲維持國家獨立，僅守禦主權線並不足夠，必須進而防護利益線，常保有優勢位置。防護利益線之道如何？各國之所為苟有不利於我者，則我有責任排除之，不得已時要以強制力來達成我方之意志。大抵上不能防護利益線之國，即使要退守其主權線，亦要依靠他國之援助，始能免於入侵，仍不可期望成為完全獨立之國家。」且又說「我國利益線之焦點實在朝鮮。」<sup>44</sup>

當時的首相山縣有朋為了懼怕朝鮮被列強占去，將危及日本之安危，而提出「主權線·利益線」之概念，並進行擴軍，以對清國備戰。甲午戰

<sup>42</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9。

<sup>43</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9。

<sup>44</sup> 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年），頁196-197。

爭勝利後，全日本民心士氣大振，山縣有朋的名言也成為圭臬。從此日本的主權線向朝鮮擴張，利益線延伸至東北，故而倡言「滿蒙為日本的生命線」。九一八事變後，主權線擴張至東北，利益線又延伸至華北，其背後皆是有山縣有朋這個明治以來的傳統思維存在。

若應用到教育文化上時，就成為實施大陸政策的配套措施。即占領大陸土地，也要能夠統治當地人民，所以就不能只是教育臺灣籍民，也要擴展至一般中國人。教育的主權線及於臺灣人與「關係支那人」，利益線則擴及到當地中國人。其所謂的自衛，就是不能僅注意守住主權線，也要占住利益線。

這種想法不僅是福州而已，廈門、汕頭亦同。1915年2月，廈門旭瀛書院教諭岡本要八郎向總督府學務部長隈本繁吉提出「在廈一年所感與鄙見」，其內容赤裸裸的表明籍民教育其實是與大陸政策不可區分的。他認為：

「以我國對華之策源地而言，北從關東州起，南至臺灣為止，南北相呼應，奠定對華的基礎。此事必須儘早進行。廈門與臺灣有相同的言語、人情、風俗、祖先，其中具備不可分的要素，因此希望總督府以某種形式，尤其是採用於臺灣有經驗的人士，來致力經營對岸。」並認為「教育及醫學應為目前對中國扶植我日本勢力最好的二個途徑。」<sup>45</sup>

1916年5月31日，汕頭領事館事務代理田中莊太郎致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請求補助東瀛學校經費。其表明日本人協會之計畫為：

不僅在穩固今後在留臺灣籍民子弟之教育方針而已，進而教化中國人，於反日思想旺盛之本地，扭轉一般中國人對日觀感，而被認為是非常適合時機的措施。<sup>46</sup>

<sup>45</sup> 〈廈門一年間ノ所感ト卑見（旭瀛書院岡本要八郎）〉，《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2414\A002。

<sup>46</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3-10-2-0-10-26。



由上可知，實際上籍民教育之宗旨，自辛亥革命後已經改變，這時其有表裏兩目的，表面上是「日支親善」，以軟化中國人的抗日意識；裏面則是培育親日分子，一旦有事能為日本效力的潛在勢力。故直呼「籍民教育」不能表現其真正意涵。

1923年1月13日，廈門代理領事河野清於致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之文書中，有：

本地旭瀛書院累年仰賴巨額補助，幸而可稱為日中親善之楔子的教育事業，至今日為止已極端順利的達到健全發展之地步，實在不勝感激。<sup>47</sup>（上標句點為筆者所加）

之語，由此可知，所謂籍民教育，已失去教育籍民之目的，其僅是為達成「日支親善之楔子」而已。其表面上標榜中日親善，而實際上是以扶植帝國潛在勢力為真正目的。故與其稱為「籍民教育」，倒不如稱為「親善」教育較恰當。

#### 四、親善教育之運作

親善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擴張其「利益線」，即招收中國學生。而三校學制皆准照臺灣教育令第四條，採用初等學校六年制。此為本科，其科目大致與臺灣公學校相同，但加有「漢文」及「官話」。<sup>48</sup>其中本科專為籍

<sup>47</sup> 〈大正十一年度廈門商業學校土地家屋買收補助ニ關スル件（在廈門佐佐木領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7249\A025。

<sup>48</sup> 〈6 臺灣籍民關係事項調查方ニ關スル件 4〉，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藏，檔號：B02031445400。教授科目如下。本科：修身、國語、算術、漢文、官話、地理、歷史、理科、圖畫、唱歌、體操、裁縫。高等科：與本科同。商業科：修身、國語、代數、幾何、商業算術、珠算、商事要項、商品學、商業地理、商業作文、漢文、官話、英語、馬來語、法制經濟、體操、商業實習。教科書：本科及高等科之教科書除漢文及官話之教科書以外，皆使用臺灣公學校之教科書。商業科則自實業學校教科書中選擇使用。

民子弟而設，課程準照公學校。

本科畢業後為施以補助教育而設有高等科（廈門），或補習科、特別科（福州）。每年分二學期，第一學期由 2 月至 8 月，第二學期由 9 月至翌年 1 月。為本科畢業者升學所設。<sup>49</sup>此後又有專修科（如福州、汕頭），以教授日語為主，課程三年，專招收中國中小學畢業者。<sup>50</sup>

吸引中國人進入籍民學校的一有效方法，則為留學誘因。特別科等專門教授日本語文，以為升往臺灣醫學校或日本留學之準備。如福州東瀛學校於 1917 年間，由於畢業者有希望進入臺灣醫學校，故中國子弟入學者增加。<sup>51</sup>汕頭東瀛學校亦於 1920 年 10 月設置特設科甲組，此為招收中國中學畢業生為進入日臺各專門學校或大學而設置的準備教育。<sup>52</sup>

另一個吸收中國學生的方法，就是減免學費。由於三校對中國子弟教育表現出異常的關心，甚至免學費，因而遭中國人側目。據 1917 年 4 月 15 日廈門《民鐘日報》所載：

（旭瀛書院）目前學生已有一百七、八十人，而籍民子弟僅不過十分之一，其餘盡為蒼霞洲附近商民子弟。其中蜑戶（住於船上者）子弟最多。蓋蜑戶不僅不要繳學費，且發給書籍紙筆墨之類，因此皆讓其子弟入學。<sup>53</sup>

蜑民無資財供子弟讀書，進入籍民學校為其理性選擇，是以教育權力自然拱手讓與日本人。

<sup>49</sup> JACAR：B02031445400。

<sup>50</sup> 〈4 臺灣籍民關係事項調查方二関スル件 2〉，JACAR：B02031445200。

<sup>51</sup> 〈3 支那並支那人二関スル狀況（第三十二報）〉，JACAR：B03041650600，頁 44-46。

<sup>52</sup> 〈3 支那ニ於ケル外国人經營ノ文化事業ニ関スル件 分割 3〉，JACAR：B05016076900。1921 年 3 月設置特設科乙組，此為中國學校轉學者而設置的日語速成教育課程，能力符合者將編入本科之預備教育。據 1923 年 7 月統計，畢業生共 21 人，其中有 12 人就業，其餘升學。其中 7 人往臺灣留學，2 人留在中國就讀中學或醫學校。而特設科修業後，11 人往臺灣留學，9 人往日本留學。

<sup>53</sup> JACAR：B03041650600，頁 4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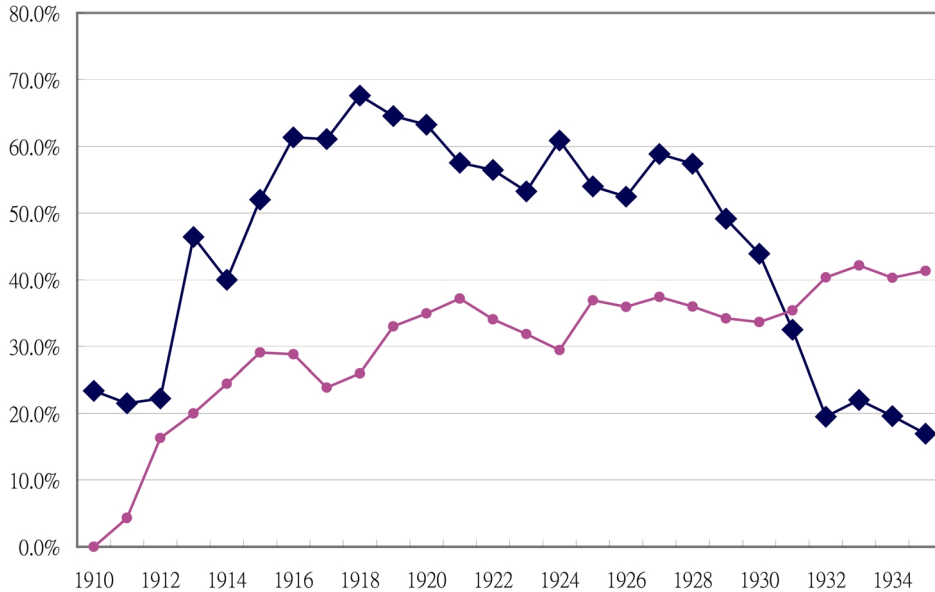


圖 1 廈門旭瀛書院華籍學生比例及女性比例

資料來源：〈臺灣居留民會三十週年紀念誌〉（1936年出版），引自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第八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30-232。

如上圖 1 所示，於 1915 年至 1929 年間，廈門旭瀛書院中國學生所占比例均超過半數，甚至有將近七成者。而廈門籍民人數較多，中國學生尚且占如此比例，至於其餘二校之中國學生皆占絕大多數。<sup>54</sup>

此外，亦致力吸收女子入學。如圖 1 所示，女子入學比例呈現穩定成長，顯示社會風氣改變。早在光緒初年間（1875-1876），廈門在基督教士的倡導下，即有戒纏足會的成立。1897 年，福州亦組織福建戒纏足會，社會人士亦開始倡興女學。<sup>55</sup>故而反映在女子入學比例上。

<sup>54</sup>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4 臺灣籍民關係事項調査方二関スル件 2〉，JACAR：B02031445200。如 1914 年福州東瀛學生 97 人當中，真正臺灣籍民子弟僅有 2 人，13 人為未入籍者，其餘 82 人皆為中國人子弟。

<sup>55</sup> 李國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4）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年），頁 561。

至 1920 年代中期，三校已大致成長為二百人至五百人的中型學校，可謂粗具規模。但據 1930 年資料顯示，由於三校不徵收學費，以致所收中國人學生多為貧家子弟。至於受教育的主角—籍民，似乎亦由於中國人子弟太多，反而希望其子弟能進入日本人小學就讀。且僅有初等教育，無上級學校，故效果不大。<sup>56</sup>也就是說，在擴張利益線之同時，亦要注意主權線是否穩固。

早在 1915 年 2 月廈門旭瀛書院教諭岡本要八郎就計畫教授中等教育，並設立醫科及商科，且獎勵畢業生往日本及臺灣留學，以「收攬中流階層以上的民心」。<sup>57</sup>且岡本於 1919 年策動臺廈紳商聯名申請設置商業學校，但不久由於南北動亂、抵制日貨等緣故，而不得不中止。後購得板橋林家林鶴壽在鼓浪嶼之私宅，而擬透過廈門領事向總督府申請補助購買，以作為廈門商業學校預定地。<sup>58</sup>但又因反日風潮而作罷，僅能於 1930 年度起於旭瀛書院附設商業科，對本科畢業生施以商業實務教育。<sup>59</sup>後於日本占領廈門後，始於 1942 年設立廈門日本商業學校。<sup>60</sup>

由於籍民學校一直未提供中等教育，故畢業後若未能往臺灣或日本之上級學校繼續升學，就只得進入中國上級學校入學，此為親善教育之盲點。因為籍民子弟一入中國學校，就常被灌輸反日思想，而有轉向的可能性，自然難以成為潛在勢力。此外，臺灣本島人由於升學不易、學費昂貴或欲往華南及南洋發展者，皆會選擇將子弟送往對岸就讀中學，<sup>61</sup>結果卻培育

<sup>56</sup> JACAR：B02031445200。

<sup>57</su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2414\A002。

<sup>58</sup> 〈大正十一年度廈門商業學校土地家屋買收補助ニ關スル件（在廈門佐佐木領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07249\A025。

<sup>59</sup> 〈6 臺灣籍民關係事項調査方ニ關スル件 4〉，JACAR：B02031445400。

<sup>60</sup>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頁 167。

<sup>61</sup>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頁 166。1923 年內田嘉吉就任總督，翌年（1924）4 月 7 日起三日間召開對岸領事會議，接著又有外務省舉辦之「南支領事會議」，兩會議中皆有討論到籍民教育。其中與會者總督府事務官三宅哲一郎曾紀錄：

出反日人士。

據 1930 年廈門領事報告所言，籍民子弟於初等教育畢業後，往廈門市及附近中等學校就讀之人數逐漸增多，共 231 人。而在華就讀之籍民學生中，有部分為當地住民之子弟，而大部分為由臺灣來廈者。其中籍民子弟最多的集美、中華、同文等學校，卻是反日思想盛行之處，曾組織閩南學生會鼓吹反日。<sup>62</sup>

1930 年代國共兩黨皆積極宣傳抗日思想，並極力拉攏臺灣學生，常有第二代籍民「轉向」的情形。1933 年 4 月，福州籍民倡議設立臺僑青年團組織，7 月確定組織綱領，並獲得福州總領事守屋和郎及臺灣總督府之同意，於 7 月 11 日於東瀛學校內舉行成立式。且以臺灣公會長林熊祥為團長，高樹發為副團長，有團員約 120 名。該會成立之表面目的為有效防止青年沉溺於吸食鴉片、賭博、飲酒，而對於彼等施以訓練，強制過有規律之生活，以改善矯正其放縱墮落之行為。但實際上是害怕籍民子弟被其他臺灣人拉去參加反日同盟會。<sup>63</sup>

---

當時臺灣人子弟留學對岸中國及英美系學校者逐漸增加，此並非因為反日思想，其主要理由如下。一、在臺灣由於對臺灣人子弟施以與日本內地同樣之教育，並未施行特別之教育，故不論如何其英文及漢文之力量極低。因此有意往華南、南洋發展之優秀學生，便希望進入洋人經營之教會學校或中國系學校。二、由於學費的關係，故公學校畢業後，不願意往日本升學。三、由於考不上臺灣之中等學校，故不得不進入華南的中學校。故如何設立以教育籍民為主之中等學校便為重要課題。

<sup>62</sup> JACAR：B02031445400，頁 13。廈門領事館認為：「彼等因學業低劣或操行不良，而不能進入臺灣學校，或入學後集體罷課等，因而遭到退學處分，以及包括因本地學費低廉而渡來者。但多半可算是臺灣的落伍者，因此多半為對臺灣並無好感之分子。大正十二年（1923）於本館之斡旋下而設立學生會，致力誘導，但不知何時而解散。最近中國學生皆以目前國民政府之金科玉律—三民主義為教訓，籍民學生等人卻恣意迎合，亦不無左傾而惡化成共產主義之思想者。這些學生等人於反日風潮熾熱時，亦會與中國學生一起行動，而敢於從事反日運動。前記學生中，於本年（1930）六月組織閩南學生會，強烈批評對臺灣統治之不滿與惡感，並祕密集會，發布印刷品等。但因害怕本館之取締而中止。」

<sup>63</sup> 〈11 昭和 8 年 7 月 1 日から昭和 8 年 8 月 26 日〉，JACAR：B02031443800，頁 16-19。

事實確實如此，若三校合一來看時，中國學生的就學情形就顯得極不穩定，以廈門旭瀛書院長期趨勢看來，則如圖 1 所示，中國學生比例自 1931 年後大幅降低，此為「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緊張所致。又如圖 2「三校入退差變化圖」所示，經常退學人數超過學校總學生數的一半以上，尤以表中負數之時，更是關係到學校之存續。而致使其大量退學的原因，如下滑面及峰谷之 1915、1917、1920、1922、1923、1927 各年前後，必定發生反日運動，以致中國籍學生產生動搖。

1915 年 5 月，由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而發生抵制日貨運動。1916 年 8 月鄭家屯事件。1917 年 5 月，福建省長胡瑞霖發起反日論調，並打擊福州東瀛學校。1918 年 5 月，由於中日軍事協定問題。1920 年五四運動並發生福州事件、1923 年發生收回旅大運動而抵制日貨、1927 年五三慘案等，使得反日及抵制日貨運動頻繁發生，這些連帶的影響到籍民學校的中國學生入退學及出席率。至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反日運動幾近白熱化，學校的經營似乎益加困難。但令人驚訝的是，大失血的翌年，入學數必定大增，而形成拉鋸戰。此雖實情不明，但若回憶起東亞書院僅因廈門事件便一蹶不振的前例時，似乎絕非單純，或許是由於籍民與「關係支那人」的不懈努力所致。但由此可知其確有「潛在勢力」存在。

實際上，若以廈門旭瀛書院主要出資者看來，除少部分為受日本保護的洋行以外，幾乎都與鴉片業者（臺灣黑幫）脫離不了關係。這些人於廈門經營煙賭嫖等非法事業，必須依賴日本領事館的庇護，因此對於日本所推行的文化事業，自然會不遺餘力的支持了。這或許也是當時日本「潛在勢力」的主要力量。<sup>64</sup>

另一個有「潛在勢力」的明顯證據，為 1928 年 11 月中旬慶祝昭和天皇登基，日本要求中國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皆配合慶祝，中國方面為維持兩國親善，雖不願意亦略作表示。其中回應者，除東北、華北等為日本所控

<sup>64</sup>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年），頁 117-118。

制之地方以外，就屬福建省最熱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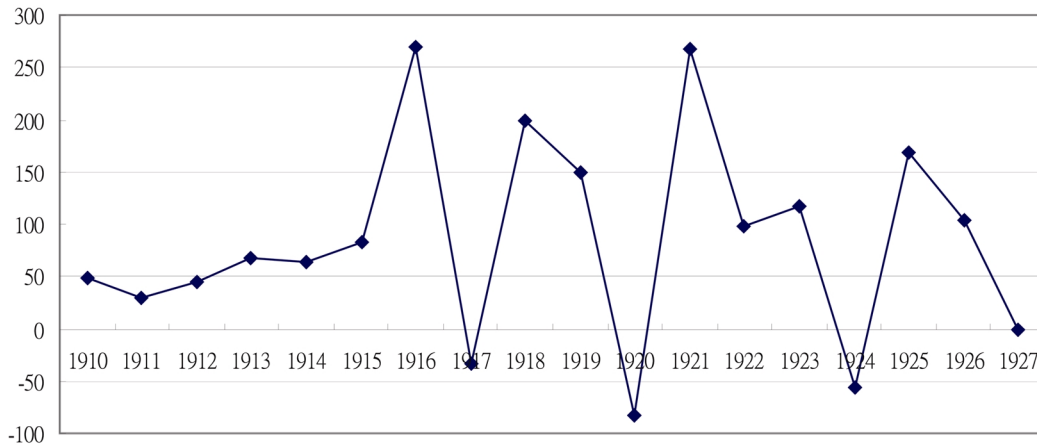


圖 2 三校入退差變化圖

資料來源：中村孝志編，1988：27, 84, 93, 102, 114-115, 132；〈臺灣居留民會三十週年紀念誌〉（1936年出版），引自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7輯，第8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32-234。

該段期間，臺灣公會及籍民學校扮演的宣傳腳色非常重要。廈門旭瀛書院於白日舉行教育展覽會、音樂會，晚間舉行演劇、放煙火。福州東瀛學校於校園內設置舞臺，下午二時起至夜晚開演中國戲劇。且福州臺灣公會於大門製作奉祝門，於庭內設置奉祝祭壇，與公會建物一同佈置以霓虹燈。「此裝飾為福州電燈公司開設以來最初之企劃，故中國人參觀者人山人海，拍照者頗多。霓虹燈自10日起至17日止每晚整夜點燈。」<sup>65</sup>

由於福建省政府的制止，該段期間反日團體的活動極少，但廈門仍有人在人群中高舉標語，如「他們的熱鬧我們不要看，我們的國權，他偏要來侵」、「去看熱鬧就無心肝」、「兄弟們五九記的麼」等，但似乎毫無效果。

<sup>65</sup> 「御大典關係一件 奉祝狀況關係 在支各館ノ部」，《外務省記錄》，檔號：L-1-1-1-1-5-4。



66

而其中最盛大的一場中日親善戲碼，為該年 11 月 17 日於福州臺灣公會樓上舉行的奉祝宴會。除公會會員外，有日本驅逐艦江風號軍官及福建省政府軍政要員參與，共計 300 餘人。開宴中，薩鎮冰將軍首先表示恭賀，並代表中國人高唱天皇陛下萬歲三聲，然後代理公會長王啟澤三唱中華民國萬歲，接著由省政府教育廳長程時燧三唱中日兩國萬歲。隨後「場外開始放煙火，爆竹之音不斷，與萬歲之聲相和，奉祝之氣漲滿福州全市，頗極盡盛況。」<sup>67</sup>

當時福建省各報幾乎不作負面報導，但仍有一、兩報說出中國人的心聲。如《國民鐘日報》對此事表示：

歡呼萬歲是舉行大典禮所常有的事，祇是歡呼的民眾對於歡呼的時候，必察這個的人配不配我們歡呼他。...若是我們不歡呼他，有第三者替我們歡呼，不特我們不承認，算作無效的，那替我歡呼的人實現諂媚的作用豈不可恥嗎？<sup>68</sup>

於昭和天皇登基的奉祝大典期間，正是潛在勢力活躍興盛之時，他們以臺灣公會及籍民學校為中心，大膽的表露出對自我民族的背棄及對侵略者的諂媚。日後得知，這些人確實也不算少數。<sup>69</sup>

<sup>66</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L-1-1-1-1-5-4。

<sup>67</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L-1-1-1-1-5-4。

<sup>68</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L-1-1-1-1-5-4。本文舉出此次中日親善戲碼為例，絕非斷言薩鎮冰、王啟澤、程時燧為對侵略者「諂媚」的潛在勢力，僅是表達當時中國人對此事的反感。自然外交場合互唱萬歲亦在所難免，此固不能成為證據。

<sup>69</sup> 國史館審編處編：《國史館數位典藏計劃出版系列 國民政府檔案（二）—國民政府對日情報及意見史料（上）》（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439。如江恒源等人呈「上蔣委員長書」中有：「日本之謀我也，利用漢奸造成變亂，在東北者固無論矣。大江南北知識分子利令智昏供其利用者，亦且實繁有徒。更有恬不知恥，四出活動，自鳴得意者。餘如各地之匪類，與夫福建之臺灣籍浪人尤為比比皆是。」明顯的中國人已將臺灣籍民視為「日本浪人」，與「漢奸」、「匪類」並列，這些人皆是本文所謂的「潛在勢力」。



至於反日意識則被壓抑至中國人的內心深處，直到下一波反日運動興起時。

## 五、中國的回應—反日教育

於擴張利益線時，如前所言，所面臨的最強大抵抗力就是中國民族意識。

其實在日據時期，臺灣人一直受到「中國」的呼喚，尤其是民國成立以後，臺灣人常對中國產生某種共同體的想像，而這種想像來自於華南輸入本島之漢文出版物。<sup>70</sup>如 1917 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編成〈臺灣與華南之關係及現在之設施與將來之方針〉所言：

臺灣住民多半是由華南渡海而來，兩者宛如血緣兄弟，至今依然面向華南並稱之為祖國，呼之為父母之邦，而眷戀不已。<sup>71</sup>

辛亥革命後，中國民族意識高漲，以教育中國人子弟為目的的中國學校不斷設立並擴張，<sup>72</sup>於是福州東瀛學堂面臨競爭的壓力。<sup>73</sup>大正南進期之

<sup>70</sup> 〈2 臺灣卜南支那卜ノ關係〉，JACAR：B03041650500。據大正三年（1914）調查，由華南輸入本島之漢文出版物，每年約一萬七千餘圓，多達十七萬冊，「其種類多為小說、歌本、書房讀本、千字文、書牘、辭典等，以歌本為例，其中有新刊民主歌、臺省民主歌、漢族民主歌等，暗地裡鼓吹反日思想或革命思想，或有描寫卑猥情緒之所謂涉及敗壞風俗者。至於小說、講談等，以彼中國流的不健全思想所構成的記載興亡叛亂之事蹟者，多為水滸傳、三國誌，亦頗為人所愛讀。...亦頗多購讀彼地所發行之新聞雜誌，其種類為四十一種，部數達三百。皆為發行於上海、福州、廈門、汕頭、廣東、香港地方之物，而以上海為中心。當局積極對此等出版物嚴格取締，明治四十三年（1910）以來禁止流傳者不少，但其檢查及取締頗為困難。」

<sup>71</sup> 〈2 特ニ臺灣警察処对策利用ノ件〉，JACAR：B03041647000。

<sup>72</sup> 〈9 廈門帝國領事館管轄內狀況調查報告書 6〉，JACAR：B03050357900，頁 1。但如前述，此時多以歐美教會學校為主。據 1923 年 3 月「廈門帝國領事館管轄內狀況調查報告書」所述，廈門地方一般教育思想極低，到處皆是文盲。中國人至 1920 年間才逐漸注意此事。

<sup>73</sup> JACAR：B02031445200。

時，大量日本人進入對岸華南，且臺灣籍民也大量增加，與中國之摩擦也逐漸升高。而 1915 年 5 月 4 日日本向袁政府發出二十一條款之最後通牒，以致各地譁然，掀起反日風潮。<sup>74</sup>但後來日本暗中支援二次革命，以致反日風潮暫緩。隨後 1917 年南方獨立時，形成南北對抗局面，日本外交明顯不利於南方軍政府，因而反日風潮再起，<sup>75</sup>而波及到福州東瀛學校。

1916 年，胡瑞霖擔任福建省長後，開始策動《建報》、《福建新報》、《求是報》、《民主報》、《華同日報》等報界反日，並全力打擊福州東瀛學校。<sup>76</sup>

原本福州東瀛學校規模簡陋，僅不過如同書房而已。然而在歐戰後英美優良教師回國，美國的捐款比以往較少，相對的，1917 年東瀛學校新校舍竣工，2 月有不少希望入學者，且其中包括一些曾經是美系青年會學校及中國小學之學生。<sup>77</sup>中國學生大幅增加，自然引起中外人士側目。

當時東瀛學校之校規第十一條規定，休業日為日本假日、中國假日、

<sup>74</sup> 〈4 支那並支那人二關スル報告（第三報）2〉，JACAR：B03041647300 汕頭於五月獨立，總司令莫擎宇為親日派。雖於 1915 年有反日風潮，但後來趨緩。〈10 支那並支那人二關スル報告（第八報）〉，JACAR：B03041647900。1915 年中日交涉之際，廣東興起反日貨運動，日本製品不能放在店頭買賣，甚至有人向日本領事館扔炸彈。日本居留民一時之間避難至香港。廈門自 1915 年中日交涉開始以來，似乎無人將房屋貸給日本人，以至日人經商感到困難。而 1916 年中日警方聯合掃蕩臺灣黑幫後，貸與籍民房屋的也變得很少。

<sup>75</sup> 〈22 支那並支那人二關スル報告（第四十八報）〉，JACAR：B03041652500，頁 2-3。

<sup>76</sup>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頁 76-77；《外務省記録》，檔號：3-10-2-0-10-9。此事見 1917 年 5 月 19 日隈本繁吉學務部長送中央「在支那福州 福州東瀛學校排斥事情」內之「派遣福州之雄谷教諭密報」。「東瀛學校之西鄰舊銅貨鑄造所開設私立臺江乙種商業學校。校長為求是報新聞社長兼總編王醒纒，如預定，胡省長每月給予三百元補助，並有其他熱心人士捐款而設立。原為本校雇員漢文教師郭雲展為首席教師，其計畫讓本校幼年科為鄰家蒼霞小學所蠶食，本校特別科為此商業學校所奪取，讓本校自然消滅。而幼年科中由蒼霞小學轉來的七人皆已轉回該校，特別科逐漸減少，出席為四、五人。加上報紙論調益加反日，若將來有可乘之機時，將必定驟然爆發抵制日貨等不幸事件。中日方面有心人憂心此事，於此際講求緩和和方法，昨夜日本人協會提出每月約定日期召開日支人懇話會之議，近日將召開第一次會談。」

<sup>77</sup>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頁 78-79。

星期天、寒暑假等；第十二條規定，本科生於日本紀元節、天長節、祝日及一月一日須到校舉行祝典。<sup>78</sup>而遭當地報紙嚴厲批評，認為有辱國家主權。<sup>79</sup>後東瀛雖對校規有所修正，但依舊在中國境內培育潛在勢力。

五九國恥後，中國的教育界對於日本的侵略意志亦作出了回應。中小學教科書上都有「國恥」一章，講述五九國恥之由來，並有二十一條習字帖，<sup>80</sup>然而這僅是民間自行發起，中國政府並未積極推動。

直到 1926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後，在中國國民黨的總號召之下，倡行「革命外交」，即擬以革命的方法與手段，來解決中外間不平等、不合理的外交關係。<sup>81</sup>其中一項就是收回教育權。至 1928 年後，外國人辦的學校有不少被接管或改組，且必須接受中國法律的限制以及宗教與教育分離的規定。且中國國民黨開始明訂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sup>82</sup>

<sup>78</sup>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頁 90。

<sup>79</sup> 〈3 支那並支那人二關スル狀況（第三十二報）〉，JACAR：B03041650600，頁 44。據當地報紙批評：「其宗旨為養成優良之國民，此究竟是何意義？若果真要養成自國國民，亦不一定要在本地設學校。目前該校學生中，臺灣籍民占十分之一，其他皆為中國人子弟。故所謂優良之國民，應不單指其本國國民而已。若果真如此，則甚為侮辱我國。教育我子弟，我國自有相當之設備，不需要接受日本之援助。且該校於日本之國定假日休假，這些僅是日本一國之節日，與美國人等所經營之學校於世界性節日休假的情形不同。讓我子弟休假成何體統？讓子弟進入這種學校就讀的家長，將使我子弟成為日本國民，就是所謂的國賊。」

<sup>80</sup> 〈排日教科書〉，《外務省記錄》，檔號：3-3-8-0-6-2。

<sup>81</sup> 李恩涵：〈北伐前後收回關稅自主權的交涉—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研究之一〉，《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 第三冊 —北伐統一與訓政建設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 年 10 月），頁 358-411。換言之，革命黨人想在不完全顧及過去中外條約、協定與慣例的前提之下，在革命精神與群眾運動的強力支持下，運用威脅性或半威脅的手段，以達成中國外交談判的目標—改變外人在華所享優越地位的狀態。而革命外交又有「激烈派」與「溫和派」二種，但 1930 年關稅自主權的收回，實為溫和派的一大外交勝利。

<sup>82</sup> 魯珍晞：〈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教育權運動中的學生與政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 第三冊 —北伐統一與訓政建設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 年 10 月），頁 316-355。1924 年，全國學生聯合會發起反基督教與收回教育權運動，但反響有限。至 1925 年五卅慘案發生，英軍於上海租界槍殺十餘名示威學生後，激起全國怒潮，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的大陸政策露骨呈現。自此，中國人民體認到「中日親善」只是騙局，<sup>83</sup>日本終有亡我之心，故輿論壓力逼迫政府抗日。至此，中國國民黨態度開始轉為主動，由中央黨部或政府向地方黨政機關授與方針，制定頒布更嚴密周到的反日思想培植方案，並上下一貫實施。<sup>84</sup>

至於福建方面之反日教育，據1932年4月20日福州總領事田村貞治郎陳報外務大臣芳澤謙吉所言：

年來省黨部宣傳部、省教育廳及縣黨部、縣教育局、民眾教育館及全省學界彼此合作，傾力在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方面注入反日思想，又利用福州市內大學及專門學校3校、官公私立中學21校、教會學校11校之學生，其數約6,200名，作為喚起一般民眾（市民約35萬）反日思想之急先鋒。另一方面又網羅各新聞雜誌（約20種）記者、新劇編演人員、通俗刊行物之作者、通俗講談之藝人（福州有數十人）等，屢次召集訓練，向社會多方面普及一齊致力於反日教育。...學校方面使用的國語、國文、地理、歷史、公民、社會、常識教科書等，幾乎都普遍的插入反日教育之

---

致使愛國主義高漲。上海立即成立「工商學聯合會」，自6月1日起罷市、罷工、罷學，並迅速波及其他重要城市。此時國共兩黨大量吸收黨員並組織訓練幹部，而急速成長。也由於該運動是大眾性的，因而也有助於結合社會其他各界，致力於完成國家統一與主權。直至國共合作結束後，在國民黨的強力運作下，全國性之教育權收回運動與反基督教運動隨即終止。

<sup>83</sup> 國史館審編處編：《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出版系列 國民政府檔案（二）—國民政府對日情報及意見史料（上）》，頁432-433。武漢大學教職員救國會呈蔣介石救國意見書有云：「『中日親善』，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原不失為一策，至九一八（事變）以後，則絕無並等親善可言。對於此...點，恐全國國民，無一人不誓死反對，...且談經濟合作，是不啻奉送華北之煤、鐵、棉花，供鄰邦造炸彈以轟炸我全國也。談文化合作，併學校教科書而亦須修改，是不啻代彼邦預先製『順民』、『奴妾』、『鷹狗』也。談軍事與之合作，是不啻合晉陝甘寧青新疆蒙古而一併奉送也。」

<sup>84</sup> 〈滿洲事變 排日、排貨關係、排日教育調查關係〉，《外務省記錄》，檔號：A-1-1-0-21-5-1。

教材。<sup>85</sup>

當時廈門大學教育學院亦基於三民主義來養成抗日教員，且又編纂多種小學生用的各學科問答書、課外讀物、或童謠唱歌集等書籍，以圖貫徹民眾抗日思想。<sup>86</sup>

至於反日教育的影響及將來，田村領事憂心忡忡地說：

如上所述，現本地反日教育已占教育事業中之重要部分，遍及各科目，且連課外時間也利用，有組織的進行，而有幾乎是為了反日而教育之感。因此，從幼稚園的兒童起至大學學生止，都抱有將來要打倒日本，復興中華，以雪恥復仇的觀念。且平常與日本人接觸時，多半顯示怨恨切齒之態度。即使是一般社會，鑒於此趨勢，於購買、販賣、搬運、使用日貨時，大致會猶疑不定，與本國人交際接觸時，亦儘量避人耳目。<sup>87</sup>

這種仇日教育從根作起，甚至福州城內布司呈街省立小學也教小學生唱反日歌。

怎樣打日本？

放在心頭上，記在腦子裏，不買日本的東西。

握著小拳頭，大家向前走，去同日本鬪一鬪。<sup>88</sup>

至此，親善教育的表面目的—「日支親善」，確定是信用破產了。

## 六、結 論

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島內教育史之課題，研究者往往陷入殖民地化與現

---

<sup>85</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A-1-1-0-21-5-1。

<sup>86</sup> 〈廈門文化工作調查報告書〉，「廈門調查團報告」，《臺拓文書》，檔號：V0242，頁 87-97。（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sup>87</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A-1-1-0-21-5-1。

<sup>88</sup> 《外務省記錄》，檔號：A-1-1-0-21-5-1。

代化兩種互斥的迷思當中，甚至無法掌握住殖民統治者之真意。但對岸籍民教育則截然不同，其工具性格異常顯著。

本文所言籍民教育，實際上在大正南進期以後，就不是為教育籍民而設，反而是以教育中國人子弟為主而設的機構。其目的有表裡兩面，表為「日支親善」，裏為「扶植潛在勢力」，故其早已喪失原初宗旨，而淪為政治的工具。由於其以教育作為中日「彼我親善之楔子」，故與其稱為「籍民」教育，不如直呼「親善」教育為恰當。

近代中國於清朝滅亡後，又一次出現解體之危機，然而其依舊不改其歷史的軌跡而再度新生與凝聚。同時，侵略性顯著的新生日本，由關東軍主導實行其大陸政策，逐步逼迫中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右派氣勢如日中天，與新興的中國民族主義互相對峙，此時處境最尷尬的莫過於在華南的臺灣籍民了。在這兩種認同的衝突下，籍民子弟如何決定自己的方向，想必是相當痛苦的，他們可謂是被犧牲的一代。<sup>89</sup>

廈門事件後，中國人對於日本的親善多抱持懷疑的態度，直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信用完全破產，中國政府亦主動宣傳反日教育與抵制日貨運動，至此親善教育的表面目的完全失敗。惟以教育機構為媒介，似乎亦拉攏不少潛在勢力，此可由三校於反日聲浪中屹立不搖之事實及天皇奉祝大典期間看出，而似乎這才是在南進政策下籍民教育真正重要的功能。

---

<sup>89</sup> 籍民的痛苦可參照吳濁流著《亞細亞的孤兒》一書。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彙編

《美國 19-20 世紀初駐廈門領事檔案 1844-1906》（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Amoy 1844-1906）。美國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典藏，臺大圖書館數位化檔。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V00427\A004，〈廈門東亞書院設立ニ關シ內務大臣稟請ノ件〉

V00497\A001，〈廈門事件閩報記事〉

V00532\A001，〈臺灣總督ト廈門福州及上海、香港駐在帝國領事間ノ直接通信ノ件〉

V02414\A002，〈廈門一年間ノ所感ト卑見（旭瀛書院岡本要八郎）〉

V04541\A001，〈對岸地方出張水崎基一報告〉

V05100\A015b，〈清國福州臺灣人子弟教育ノ為メ三屋教諭派遣ニ關シ照復ノ件（在福州領事）〉

V07249\A025，〈大正十一年度廈門商業學校土地家屋買收補助 關スル件（在廈門佐佐木領事）〉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V0242，〈廈門文化工作調查報告書〉，「廈門調查團報告」，頁 87-97。

《外務省記錄》（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3-3-8-0-6-2，「排日教科書」

3-10-2-0-10-9，「福州東瀛學校」

3-10-2-0-10-26，「汕頭東瀛學校」

6-1-6-0-66，「汕頭領事館報告書」

A-1-1-0-21-5-1，「滿洲事變 排日、排貨關係、排日教育調查關係」

- L-1-1-1-5-4, 「御大典關係一件 奉祝狀況關係 在支各館ノ部」  
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所藏檔案 (JACAR)
- B02031443800, 〈11 昭和8年7月1日から昭和8年8月26日〉、「臺灣人關係雜件」(A-5-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B02031445200, 〈4 臺灣籍民關係事項調査方ニ関スル件 2〉、「臺灣人關係雜件」(A-5-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B02031445400, 〈6 臺灣籍民關係事項調査方ニ関スル件 4〉、「臺灣人關係雜件」(A-5-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B02031928600, 〈4 明治33年8月31日から明治33年9月3日〉、「義和團事變關係一件 (明33・3・15) / 各地警備 / 廈門 (本願寺焼失始末)」(A-6-1)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B03041647000, 〈2 特ニ臺灣警察処対策利用ノ件〉、「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一卷」(1-5-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B03041647100, 〈3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報告 (第二報)〉、「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一卷」(1-5-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B03041647300, 〈4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報告 (第三報) 2〉、「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一卷」(1-5-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B03041647800, 〈9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報告 (第七報)〉、「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一卷」(1-5-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B03041647900, 〈10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報告 (第八報)〉、「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一卷」(1-5-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B03041649800, 〈29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報告 (第二十七報)〉、「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一卷」(1-5-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B03041650500, 〈2 臺灣ト南支那トノ關係〉、「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二卷」(1-5-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B03041650600，〈3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狀況（第三十二報）〉、「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二卷」（1-5-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B03041650700，〈4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報告（第三十三報）〉、「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二卷」（1-5-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B03041652300，〈20 臺灣ト南支那トノ關係及現在 施設並将来ノ方針〉、「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二卷」（1-5-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B03041652500，〈22 支那並支那人ニ関スル報告（第四十八報）〉、「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二卷」（1-5-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B03050357900，〈9 廈門帝國領事館管轄内狀況調査報告書 6〉、「各国事情關係雜纂／支那ノ部／廈門」（1-6-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B05016076900，〈3・支那ニ於ケル外国人經營ノ文化事業ニ関スル件分割 3〉、「支那ニ於ケル文化事業調査關係雜件／外国人ノ文化事業 第三卷」（H-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第八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國史館審編處編：《國史館數位典藏計劃出版系列 國民政府檔案（二）—國民政府對日情報及意見史料（上）（下）》。臺北：國史館，2002年。

## （二）專書

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年。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天理教道友社，1988年。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年。

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1895-1945）》。樂學書局，2006年。

李國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4）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閩浙臺地區，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

陳小沖：《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五十年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9月。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年。  
東京：勁草書房，1990年7月。

### （三）論文

中村孝志：〈東亜書院と東分学堂—臺灣總督府華南教育施設の濫觴〉，《天理大学学报》，124（1980年3月）。

中村孝志：〈福州東瀛学堂と廈門旭瀛書院—臺灣總督府華南教育施設の開始〉，《天理大学学报》，128（1980年9月）。

李恩涵：〈北伐前後收回關稅自主權的交涉—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研究之一〉，《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 第三冊 —北伐統一與訓政建設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10月，頁358-411。

林明德：〈民初日本對華政策之探討（1911-191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下冊（1974年12月），頁413-459。

黃自進：〈利用與被利用：孫中山的反清革命運動與日本政府之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9期（2003年3月），

頁 107-152。

魯珍晞：〈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教育權運動中的學生與政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 第三冊—北伐統一與訓政建設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10月），頁316-355。

鍾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年12月），頁2,063-2,090。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31期（2003年6月），頁169-221。

戴國輝著、洪惟仁譯：〈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與臺灣籍民〉，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新編》（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頁251-284。

